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背后的故事

——访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文本团队负责人吕舟

本报记者 赵晓霞



孟丽静编制 (新华社发)

价值阐释

记者：在世界遗产层面上，“北京中轴线”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

吕舟：“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基于“北京中轴线”作为世界遗产所应具有的价值标准的阐述。其中，尤其是关于列入世界遗产的对象应当是“能为延续至今或业已消逝的文明或文化传统提供独特的，至少是特殊的见证”的标准。

“北京中轴线”的核心价值在于其通过建筑群和城市空间表达了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和审美意识的持续影响。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15、16世纪“北京中轴线”始建时对于公元前1000年周代城市制度的表达，也体现在15、16世纪“北京中轴线”成形的过程和18世纪的不完善，更体现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天安门广场建筑群的规划和功能定位，以及21世纪初开始对“北京中轴线”一系列的保护措施。

“北京中轴线”是在已有的1223处世界遗产中，是“为延续至今的文明提供了独特见证”这一标准具有典型性的实例。在世界遗产标准中，关于“为延续至今的文明提供了独特见证”的表述最早出现于1996年，是当年世界遗产回应如何反映不同的文明发展状况的结果，但长期以来在世界遗产的评审中，遗产依然被传统的历史分期所局限，没有出现突破这种历史分期，特别鲜有是将古代遗产与当代城市形态融为一体的遗产项目。从这个层面，“北京中轴线”响应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文明的多样性的表达。

记者：这样的价值表达在“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的评审过程中是否会遇到挑战？申遗团队是如何面对这些挑战并解决这些问题的？

吕舟：从遗产保护领域自身而言，不同观点的碰撞始终是存在的。

这些碰撞不仅表现在今天已被人们熟知的真实性是仅仅反映在物质的真实性上还是反映在信息来源的真实性上，同样也反映在我们所谈到的遗产的时间边界上。

2024年4月，我们收到了专业咨询机构对“北京中轴线”的评审意见，尽管他们给出了推荐列入的结论，但我们仍然感受到参与评审的专家在遗产的时间边界上的矛盾，一方面他们肯定了“北京中轴线”的传统规划思想对当代城市规划的影响，另一方面又质疑了遗产的时间线延续到当代的延续性理念。

针对这种情况，申遗团队进行了大量国际对话和价值阐释的工作。通过各种机会向来京参加各种活动的专业咨询机构的负责人等介绍“北京中轴线”，让他们通过现场的体验来感受我们对“北京中轴线”所呈现的文明的延续性。

“北京中轴线”所展现出的整体性和系统性，感染了这些专家等。经过反复讨论，他们都表示充分理解了我们对“北京中轴线”的价值表达。在之后的世界遗产大会上也都给予极大支持。

中国申遗团队也拜访了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或代表，向他们介绍“北京中轴线”在价值表达中关于文明延续性的阐释，并得到了他们的理解和认同。这使得我们充分感受到了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世界遗产价值阐释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国际传播的过程，是一个向世界介绍中华文明，促进世界理解中华文明的过程。

在讨论“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21个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的代表，有13位作了现场发言，对“北京中轴线”关于文明延续性的表述表达了支持。

希腊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提出了修正案，要求删去决议草案中对时限问题的质疑，他强调中国

的文明是延续的，“北京中轴线”也是一个延续的、活态的遗产；黎巴嫩代表发言，特别强调了：天安门广场及建筑群是沿“北京中轴线”组织起来的宏大城市建筑群的主要构成要素，它见证了中国传统的历史延续性；赞比亚代表发言，明确强调了“北京中轴线”各个时期的遗产构成要素对整体价值的共同作用；塞内加尔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认为“北京中轴线”展现了中国独特的历史延续性；土耳其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使在发言中表示“北京中轴线”见证了中国社会从封建王朝统治至现代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并展现出时间与空间的历史延续性；日本代表也从专业的角度讲述了中国都城规划理念的广泛影响，并表示“北京中轴线”的保护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在大会会场，深刻地感受到通过世界遗产进行广泛深入的国际对话与交流，有助于促进世界了解中国。

重要挑战

记者：作为申遗保护文本团队的负责人，在您看来，如何向世界讲述“北京中轴线”故事？

吕舟：在“北京中轴线”申遗过程中，我们一直在强调国际对话和交流。在编制申遗文本的过程中，如何在世界遗产的语境中把中轴线的价值说清楚，从语境、内涵上更充分地把北京的历史文化这种价值呈现出来，这也是申遗文本编制的难点。

记者：在申遗文本提交后，我们又补充了材料，主要是哪方面的？

吕舟：通过专业咨询机构对我们提交补充材料的要求，也是我们了解他们对“北京中轴线”价值理解程度或这种理解存在的空白点的过程。

我们一共补充了两次材料：一次是介绍《考工记》及其规定、与其他城市规划理论的不同之处；一次是解释“北京中轴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和“和”理念在都城规划与建设物质层面的集中体现。在关于《考工记》的补充材料中我们介绍了《考工记》整体内容、其中关于城市制度的部分，比较了它与其他涉及中国城市规划的古籍内容的区别，也介绍了它所描述的城市制度与古代罗马建筑文献《建筑十书》中相关内容的差异。

事实上，这两次补充材料也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了关于“北京中轴线”及中国文化在国际遗产领域的知识盲点。对这些内容就需要在之后的交流对话中给予更多的关注，用更简单清晰的表述去帮助对方理解。

记者：“北京中轴线”申遗历时12年，回顾整个申遗过程，主要面临的挑战是什么？

吕舟：“北京中轴线”申遗的挑战，主要体现在古今交融而产生的复杂性上。当然也包括了如何处理作为“北京中轴线”组成部分的已有世界遗产地，如故宫、天坛、万宁桥各自已被《世界遗产名录》所阐释的价值与“北京中轴线”价值的关系上。以及由于“北京中轴线”位于北京这样一个国际大都市的核心区域所带来的

保护、管理的复杂性。

“北京中轴线”位于首都的中心区，与当代的现实生活密切融合，你是无法把它切开的。比如，前门大街是商业活动区，地安门外大街也是商业活动区等，它们跟老百姓的生活融在一起，这也是复杂性的体现。

“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是无数人努力的结果，凝结了无数人的心血。

成功经验

记者：“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有哪些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

吕舟：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过程中，民众广泛参与是很成功的经验之一。刚开始时，我们也会想，会不会增加申遗过程的复杂性？但事实证明，民众参与形成了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北京鼓励居民参与“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和城市治理，在涉及“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的决策出台之前，北京市会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居民的意见建议，之后由专业机构将公众意见转化为提案或者报告，再经由专家研讨、部门商议、征求公众意见等程序后形成政府决策，直至最终实施。

经过近几年的实践，“北京中轴线”遗产区、缓冲区居民和社区已成为参与遗产保护管理相关决策与实践的重要力量。也正是在居民和社区的积极建言献策下，才推动了如万宁桥交通限行、补种树木等具体保护整治行动的实现，促使“北京中轴线”以及北京历史文化名城得到全社会更好地保护传承。

此外，还出现了很多中轴线文化体验的旅游产品、创意设计、文化体验线路，一些北京老字号也会用“北京中轴线”的IP来更新他们的产品，这些都为北京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历史文化动能。

记者：除“公众参与”之外，您也强调“数字技术参与”的重要性，在“北京中轴线”申遗的过程中，数字技术发挥了哪些作用？

吕舟：可以说，在“北京中轴线”申遗之前，鲜有数字技术如此深度参与申遗的实例。数字技术如同一个时空穿梭机，可以把不同时期的遗产要素生动表现出来，也可以推进遗产保护。比如，可以通过北京中轴线文化遗址监测与保护平台监测遗产的变化，可以通过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联合腾讯等机构开展的“数字打更人”活动，为公众提供参与中轴线保护的渠道，让人们可以随时随地监测“北京中轴线”的情况。这都是申遗过程中的创新措施。

记者：“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在世界遗产领域有哪些贡献？

吕舟：世界遗产是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对其的保护是不同文化对话合作的过程，通过对世界遗产的价值阐释，可以实现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与理解。“北京中轴线”申遗成功对未来世界遗产的类型、申报方法和对历史文化延续性的表达都具有重要意义，提供了新的经验。

中国考古博物馆“1岁”了

本报记者 赵晓霞

9月15日一早，位于北京的中国考古博物馆迎来了首批观众。当日，前10位入馆观众可以获得中国考古博物馆开馆一周年纪念礼物。“感觉很荣幸。”一名幸运观众说，“我之前就来过中国考古博物馆，印象很好，这次是听说博物馆又开了新展，所以想再来看看，没想到能收到馆长亲自赠送的礼物，感觉特别开心和有意义。”

新展：探究百万年人类史

这名观众所说的“新展”是中国考古博物馆日前上新的“百万年人类史”专题展。“该展览展出的泥河湾遗址群和学堂梁子遗址，为观众理解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提供了两把关键钥匙。”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考古博物馆馆长刘国祥说。

泥河湾遗址群主要位于河北省张家口市阳原县，主要分布于泥河湾盆地中的阳原盆地，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最重要的区域。自1965年以来，发现距今约176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遗址300余处。目前，已发掘马圈沟、马梁一后沟、许家窑—侯家窑、板井子、于家沟等一批重要遗址，记录着东亚人类176万余年的过往，被誉为“东方人类的故乡”。

“其中，马圈沟遗址发现10个层位的遗存，年代在距今约176万至132万年。累计出土近万件石器、动物化石，是早期人类在亚洲出现并演化的实证。马圈沟遗址第Ⅲ文化层还揭露出一组体现人类肢解、餐食草原猛犸象的遗存。第Ⅱ文化层揭露出草原猛犸象脚印40余个，多数脚印个体结构保存较好，尚可分辨出清晰的脚趾结构。”一名观众对展板上介绍的草原猛犸象相关遗存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

学堂梁子遗址是一处集古人类、古动物、石器三位一体的世界著名旧石器时代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原郧县）青曲镇弥陀寺村，目前已发现3具被命名为“郧县人”的完整人类头骨化石，实证了中国百万年人类史。

据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学堂梁子遗址考古项目负责人陆成秋介绍，学堂梁子遗址发现于1989年。1989年发现第一具头骨化石，1990年发掘出土第二具头骨化石。1990年至2008年历经5次发掘，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和动物化石等遗物。“2021年，学堂梁子遗址再次进行发掘，由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武汉大学等单位联合组成了科学研究团队。2022年5月18日，发现了‘郧县人’3号头骨化石。”

陆成秋告诉记者，“郧县人”3号头骨保存较为完好，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了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该化石处在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节，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化石和文化证据。”

刘国祥表示，中国考古博物馆有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考古成果展示，通过这两个新增的展厅，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使我们中华文明溯源序列更加完整，使广大观众能够更系统更完整地认识我们中华大地上人类发展的历史。



观众在参观“百万年人类史”专题展。本报记者 赵晓霞摄

互动：感受田野考古魅力

自开馆以来，中国考古博物馆通过多种方式致力于考古成果的普及传播并注重公众观展体验。数据显示，1年来，中国考古博物馆“每月文物上新”至今已累计更新文物文献120件（组），举办了30余场科普讲座，进行了3200余场专业讲解。

该馆还通过视频呈现、多媒体互动、场景模拟、裸眼3D等多角度多侧面展示文物细节，使观众自主参与，仿佛置身于古代社会，在当下的氛围中体验历史，产生情感共鸣。

“我对馆里的布置、沉浸式体验印象深刻。比如，独特的环境布置让我感觉自己置身于史前时代；我也可以在大口陶尊前，通过触摸屏与展示物品进行互动……这些都很有意思。”观众王月是在北京读书的一名大二学生，已经来过3次中国考古博物馆，每次都有“不一样的收获”。

在开馆1周年之际，中国考古博物馆3层演讲互动区座无虚席，观众正在等待该馆面向公众举办的首次考古工地视频连线活动。

从河南安阳殷墟洹北商城遗址宫殿区一号基址考古工地到河南洛阳二里头遗址骨角器加工坊考古工地，再到山西临汾陶寺遗址手工作坊区考古工地，博物馆的现场观众与发掘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通过视频对话，感受田野考古工作的内容与魅力。

“这是非常独特的体验，让我们对考古工地有了直观的感受。能和这几处遗址的考古工作者对话，感觉特别幸运。”一位带着孩子的妈妈如是表达自己的感受。



观众与发掘现场的考古工作者通过视频对话，感受田野考古工作的内容与魅力。中国历史研究院供图



“北京中轴线”北段鸟瞰。

北京中轴线申遗保护工作办公室供图